

語言學·漢語類CSSCI來源集刊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

漢語史 研究集刊

HAN YU SHI YAN JIU JI KAN

第十八輯

巴蜀書社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

漢語史研究集刊

第十八輯

巴蜀書社

中國・成都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漢語史研究集刊. 第十八輯/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,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編. —成都: 巴蜀書社, 2014. 12
ISBN 978-7-5531-0495-9

I. ①漢… II. ①四… ②四… III. ①漢語史—研究—叢刊
IV. ①H1-0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12538 號

策劃組稿: 楊宗義
責任編輯: 譚曉紅 楊宗義
封面設計: 楊 丁

漢語史研究集刊(第十八輯)

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 編

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(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政編碼 610031)
總編室電話 (028) 86259397 發行科電話 (028) 86259422 86259423
網址 www.bsbook.com
成都翔川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

成品尺寸 203mm×140mm 印張 13.625 字數 350 千
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31-0495-9

定價: 45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

主 編 俞理明

副主編 雷漢卿(常務)

學術委員會

丁邦新(香港科技大學)

高田時雄(日本京都大學)

何莫邪(Christoph Harbsmeier,
挪威奧斯陸大學)

江藍生(中國社會科學院)

蔣紹愚(北京大學)

柯蔚南(W. South Coblin, 美國
依荷華大學)

魯國堯(南京大學)

梅維恒(Victor H. Mair, 美國賓夕
法尼亞大學)

梅祖麟(美國康乃爾大學)

裘錫圭(復旦大學)

王邦維(北京大學)

王 寧(北京師範大學)

項 楚(四川大學)

向 熹(四川大學)

辛島靜志(日本創價大學)

徐文堪(漢語大詞典出版社)

薛鳳生(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)

衣川賢次(日本花園大學)

游汝杰(復旦大學)

張永言(四川大學)

趙振鐸(四川大學)

佐藤晴彦(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)

編輯委員會

曹廣順(中國社會科學院)

董志翹(南京師範大學)

馮勝利(美國堪薩斯大學)

管錫華(四川師範大學)

何寶璋(美國聖十字學院)

洪 波(首都師範大學)

蔣冀騁(湖南師範大學)

蔣宗福(四川大學)

雷漢卿(四川大學)

劉 利(北京師範大學)

譚 偉(四川大學)

汪啟明(西南交通大學)

汪維輝(浙江大學)

伍宗文(四川大學)

楊 琳(南開大學)

楊宗義(巴蜀書社)

俞理明(四川大學)

張顯成(西南大學)

張涌泉(浙江大學)

朱慶之(北京大學)

本期執行編委 俞理明 雷漢卿 王彤偉

本期編務主持 王彤偉

目 錄

關於《集韻校本》

——敬復王培峰先生	趙振鐸(1)
《詩》語問詁(一)	董志翹(7)
《馬氏文通》以前的漢語詞類分析	俞理明(21)
中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	周俊勛 高 韜(47)
先秦漢語連詞“苟”用法考察	龔 波(69)
“老子”源流考	朱冠明(100)
量詞“回”源流淺探	王彤偉(113)
《說文解字》誤立字頭現象分析	張金霞 翟春龍(122)
《篆隸萬象名義·水部》呂校補正(下)	郭 萍(135)
上古聯綿詞爲遠古複輔音之遺存	
——《詩經》聯綿詞前字影母奇高的渾沌語言學解釋	
.....	肖姪曼(151)
漢字俗寫規律在古籍整理中的利用	曾 良(172)
高麗本《龍龕手鏡》疑難注音釋義割考	鄭賢章(188)
陸德明《禮記音義》校注拾遺	沈紅宇 葉桂彬(201)
反切引發今音誤注的有關問題	范新幹 韓曉雲(213)
《廣韻》與實際收字處音切不一致之又音釋疑	趙 庸(219)
廣西社坪客家話音韻變異探源	李 玉(239)
略論《太玄》的押韻	伍宗文(253)
《文選》李善注“協韻”研究	賀菊玲(269)

《太上洞淵神咒經》的用韻和它的寫作年代	夏先忠(288)
禪籍疑難詞語考(下)	詹緒左(301)
以西北屯戍簡牘證揚雄《方言》中若干“關西”詞語	魏德勝(322)
“張致”與“失張失致”考源	楊琳(331)
“花子”補義	魏業群 崔山佳(342)
《燕子賦(一)》“躡履”考辨	趙家棟(353)
趙憲《朝天日記》與許筠《朝天記》詞彙比較研究 ——兼論《燕行錄》語言研究之意義	謝士華(360)
科舉文獻語詞研究芻議	孫中強(380)
漢語“贈予”概念場常用詞演變研究	陳家春(398)
認知視角下的贛語詞義演變外部動因分析	肖九根(421)

關於《集韻校本》

——敬復王培峰先生

趙振鐸

內容摘要：王培峰《〈集韻校本〉疏失補正》一文針對《集韻校本》提出了數條意見。本文在認真學習研讀這些意見的基礎上認為：《集韻校本》底本的選定是以流傳廣泛、易於獲得為依據的；《集韻考證》內容應當補入《集韻校本》，但衛天鵬和丁士涵校語未必來自《集韻考證》。以此作為對王文的回復。

關鍵詞：集韻校本 底本 集韻考證 衛天鵬 丁士涵

拙著《集韻校本》問世以後，蒙王培峰先生不棄，撰文評駁^①，拜讀數四，振聾發聵，獲益良多。然亦有一二處尚有不明確者。謹撰此文，敬復培峰先生。伏望先生有以教我。

一 關於校書底本問題

校書選擇底本至為重要，選擇一個好的本子作工作底本，然後用其他的本子對校，這是校書常用的方法。好的本子應該是內容完整，文字比較正確的，不一定是所謂的善本，就《集韻》來說，我選擇清朝嘉慶十九年（1814）顧千里重修本，是經過認真

① 《漢語史研究集刊》第十七輯，巴蜀書社，2014年。

考慮的。

《集韻》一書編成於宋仁宗寶元二年（1039），慶曆三年（1043）鏤版刊行。兩宋時期各地有一些翻刻本，據目前所知有中原刻本、蜀中刻本、明州刻本、潭州刻本、金州刻本等。慶曆原刻本及上述前兩種刻本已經看不見了，其餘三種宋本，今天都有影印本傳世^①。

元明兩朝四百年間，《集韻》沒有重刻過，宋代的刻本隨著時間的推移少了起來。當時社會上出現了這書的鈔本，但是數量不大，到了明末清初，見過這本書的人已經不多。博學多聞的學者如顧炎武，也因為沒有見到這部書，而認為它已經亡佚^②。

清朝康熙年間朱彝尊從常熟毛扆處借得一部影宋鈔本《集韻》，把它交給曹棟亨，請他鏤版印行，以廣流傳，康熙四十五年（1760）書在揚州刻成，於是《集韻》又有了刻本在世上傳播。這個本子就是通常所說的曹本。它對於後來《集韻》的傳布有很大的影響，清代幾個《集韻》本子都是根據它來的。

《集韻》是官修書，書中粗疏的地方不少。清朝姚覲元批評它是“觸處皆幹”，不是誇張之詞。曹棟亨得到的宋本，據筆者觀察，它的母本應該是清宮裏面那部潭州刻本^③。但是曹棟亨在刻書的時候，又按照自己書的編排格式，重新編排抄寫，這一改

① 潭州本原為清宮舊藏，現歸首都圖書館。1984年中華書局影印編入《古逸叢書》三編，明州本原藏清朝大臣翁同龢家，為其後人攜去美國，現藏上海圖書館。1993年文物出版社曾於翁氏後人處借得影印。金州本原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。缺卷一，2001年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》，由錢裝書局影印出版。

② 顧炎武《音論》卷上：“李焘《五音韻補序》又曰：‘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皆莫如《集韻》詳，故司馬光因以修《類篇》，是則宋時韻學元有詳略二書，今《集韻》不存，而後人祖述者皆本之《韻略》耳。’”

③ 參見拙作《記〈古逸叢書〉三編影宋刻本〈集韻〉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1995年1、2期合刊。

動，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錯謬，正如姚覲元所說“其書版刻精工，而校讎未善，識者之所弗取”。

到了嘉慶年間，曹本の木版已經有破損殘缺，不進行修補，就無法重印。有人提出重修的倡議，由有名的校勘學家顧廣圻主持其事，嘉慶十九年修補完畢，刊刻印行，稱為顧氏重修本。這個本子行款格式一律依照曹本，祇是補刻了一些破損的版子，對曹本基本上沒有改動。

光緒年間，歸安姚覲元任川東布政使，在任上他刊刻了《集韻》，同時刊刻的還有《類篇》和《禮部韻略》，合稱“姚刻三種”。他刊刻《集韻》也是根據曹本，從姚覲元的序文可以看出，他本來打算在書的後面附一個校勘記，但是索要書的人太多，祇好將正文印出，校勘記就沒有附上，現在首都圖書館藏有姚覲元的《集韻校證匯編》稿，僅存四卷，不到《集韻》全書的一半，從他收集材料看，他已經看到了南宋明州本和汲古閣影宋鈔本，還用了余蕭客、韓泰華、呂賢基等人校勘《集韻》的成果。

從以上的論述，可以看到，清代康熙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社會上流行的《集韻》，基本上是曹本系統。

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中國書店影印了顧氏重修本《集韻》，使這個系統的本子能够更廣泛的流傳，社會上人們持有的《集韻》本子，基本上是曹本這個系統，因此選擇顧氏重修本作爲校本的工作底本，能够滿足絕大多數持有這種本的人的需要。

至於明州本《集韻》，固然它是一個善本，其文字質量比其他兩個宋本爲優，但是明州刻本持有的人不多，清朝時候最爲人知的是翁同龢家有一部，其他就不爲人知了^①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《集韻》，它

① 參見拙作《集韻研究》170頁，語文出版社，2006年。

的母本就是明州本，於是世上有了明州本流傳，但是這個本子脫漏極多^①。九十年代翁氏這個宋本影印出版，但是印數不多，而且售價昂貴，持有的人遠遠少於持有曹本系統的人。

還需要指出的是，清代學者已經看出明州本和曹本不是一個刻本系統，段玉裁、馬釗用曹本和母本為明州本的汲古閣影宋本作比較得出了這個結論^②。仔細比較這兩個本子，不難發現，它們之間有小韻字的排列前後不同，有的切語用字不同，還有文字的衍譌缺脫情況不一樣等情況^③。如果用明州本作底本寫出校記，用來讀曹本系統的《集韻》，有時會有一個版本轉換問題，反而不方便。

我在《集韻校本》的序裏面曾經寫道：“校本以嘉慶十九年顧廣圻重修本為底本，因為這個本子在曹本的基礎上對一些錯譌有所改正，上世紀末中國書店又曾經影印過，流傳較廣，容易得到。”這就是我選擇底本的原因，現在重申我這個觀點。

二 關於《四庫全書考證》之《集韻考證》問題

《四庫全書考證》卷二十一有《集韻考證》一種，以傳世典籍用他校法校理《集韻》所得結論可靠，但是清代有些四庫全書館臣，如王念孫，曾經供職四庫全書館，他對《集韻》有研究，但是他的這些研究並沒有被採錄，這是奉旨撰寫考證之類著作的館臣的通病。振鐸 1990 年去江浙一帶訪書，因姜亮夫仁丈關係，在原杭州大學圖書館見到孫氏玉海樓藏一部《集韻》批校本，朱

① 參見拙作《述古堂影宋抄本〈集韻〉二三事》，《新國學》第一卷，巴蜀書社，1999 年。

② 《漢語史研究集刊》第十七輯，巴蜀書社，2014 年。

③ 《漢語史研究集刊》第十七輯，巴蜀書社，2014 年。

墨滿紙，據雪克教授相告這部書的批語裏面有不少“珪案”，應該是方成珪家舊藏，中以朱筆過錄《集韻考證》材料不少。當時《集韻校本》的編撰工作已近尾聲，覺得它和以前收錄到的清人校本無多大差別，而且所校清人校本多已涉及，就沒有再收錄了。現在看來，這個作法是不妥當的。

培峰先生建議若《集韻校本》日後修訂，應將《集韻考證》的內容補進去。這話完全正確，假我以年，修訂再版時可以將它補進去，放在余蕭克校語之後。

培峰先生研究了《集韻考證》和衛天鵬、丁士涵、方成珪諸人校語，第一次提出這三種校本部分或全部出自《集韻考證》，橫空出世，石破天驚，發前人所未發。

方氏書中引用有《集韻考證》文字，而他家藏本《集韻》書眉幾乎全部過錄了《集韻考證》，說他的校語來自《集韻考證》，應該說得過去。

但是衛天鵬和丁士涵的情況就不一樣了，在不多的有關兩人的資料中都沒有有關兩人與《集韻考證》關係的記載，他們的校語裏面也沒有直接引用《集韻考證》的話，單憑校語結論和一些校勘用語相同就說他們抄自《集韻考證》，那麼其他一些清人的校語也有同樣的情況，是不是也可以得出同樣來自《集韻考證》的結論呢？

以衛天鵬、丁士涵的學識和功力，用傳世典籍校《集韻》，是完全勝任的。特別是丁士涵，他是清代學者陳奐的學生，從陳奐受《管子》《集韻》之學，他於《集韻》用功最勤，近人王欣夫先生曾在上海圖書館藏丁氏校本上面寫有跋語介紹他治《集韻》的情況，謹錄如下：

唯丁書收羅校訂最為繁富精詳。當時丹鉛勤劬，廿年不下樓，成校語五萬餘條。歿後疊閉數十年，從未顧視，前年其族人丁君載庵曾約孫伯南先生宗弼欲為理董付梓，伯南先

生更來慫恿襄助爲理，卒以斯事體大。荏苒至今。

今天看到丁氏批在《集韻》書上的校語並不多，他那五萬條校語，不知尚在人間否？但是從丁氏所批校材料看，丁士涵是完全能夠獨立校勘集韻的。

《集韻考證》的成就是客觀存在的，在清代它藏於深宮，不是任何人都能夠見到的，這就是清人校本裏面少有提到它的原因，而就是沒有引用，也無損於這部書的價值。

培峰先生的論斷還不敢說就是結論，因爲他僅是一種推斷，缺乏明確的使人信服的論據，要使“史無明文”到“立論有據，令人信服”，還需要進一步努力。

Some Issues on The Correction of Jiyun

——Reply to Mr. Wang Peifeng

Zhao Zhenduo

(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, Sichuan University, Chengdu 610064)

Abstract: Wang Fengpei's paper *The Investigation The Correction of Jiyun* put forward several opinions according to *The Correction of Jiyun*. This paper has learned these opinions carefully, and believed that the reason of selecting the original version is based on its widely circulated and easy to get; *The Etymological Note of Jiyun* should be added into *The Correction of Jiyun*, but Wei Tianpeng and Ding Shiha's notes are not from *The Etymological Note of Jiyun*. These are just the replies to Wang's article.

Key words: The Correction of Jiyun; The Original Version; The Etymological Note of Jiyun; Wei Tianpeng; Ding Shiha

(趙振鐸，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，郵編 610064)

《詩》語間詁（一）*

董志翹

內容摘要：《詩·邶風·靜女》中的“彤管”的解釋，是《詩經》研究史上的一樁公案。數千年來衆說紛紜，然總覺不盡人意。今謂“彤管”實即“彤管”，而“管”亦“蘭”也。“彤管”即“彤管”，亦即“紅蘭”，本文擬從文字、音韻、詞義及民俗諸方面略加論列，以就教於方家云。

關鍵詞：詩經 彤管 彤管 紅蘭

《詩經·邶風·靜女》凡三章，章四句：

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，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

靜女其嬀，貽我彤管，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

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，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

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優美情詩。王力先生的《古代漢語》、北大中文系編寫的《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》以及余冠英先生的《詩經選》，趙浩如先生的《詩經選譯》，都選錄了這首詩，可見這首詩的影響之大。對這首詩中名詞“彤管”的解釋，千百年來，古今學者衆說紛紜，各執己見，莫衷一是，至今沒有定論。宋代朱熹《詩集傳》云“不詳何物”，態度雖謹慎，然未能解決問題。迄今較有代表性的說法，舉其大端，約有五種之多。

* 基金項目：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（2010—2015）“漢語史語料庫建設研究”（項目編號：10&ZD117）。

最早的解釋是《毛詩傳》：“彤管，赤筆管，古代女史以彤管記事，後因用於女子文墨之事。”^①這種看法為董仲舒進一步闡發。清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云：“牛亨問：‘彤管何也？’董仲舒答曰：‘彤者，赤漆也，史官載事，故以彤管，赤心記事也。’”^②董說除了擴大了彤管使用者範圍外，還強調“彤管”在命名上的象徵意義，所謂“赤心記事”。聽起來振振有詞，其實漏洞百出，前後矛盾。第一，如上述，若彤管為女史專用筆，則靜女當是女史；若彤管為史官專用筆，則靜女當為史官之女。是女史，則應居宮中，行所謂“女史彤管之法”（《毛詩傳》）；是史官之女，則應居城裏。然而第三章詩裏則明明寫著“自牧歸荇”。按：《說文》云：“牧，養牛人。”^③又《史記·周本紀》“麋鹿在牧”引徐廣注云：“牧，郊也。”^④郊外的養牛人如何同“女史”或“史官之女”聯繫起來呢？第二，把用來“赤心記事”的彤管饋贈情人，未免有瀆“聖賢”之嫌。王夫之《詩廣傳》云：“其二章（指《靜女》第二章——引者注）曰：‘貽我彤管’，其貽可知已。彤管，貞物也，貞物而淫用之，顧名不嫌而僅詫其煒也。”^⑤王氏所論甚是。第三，先秦沒有“管”作“筆”的記載。《說文》：“筆，秦謂之筆，從聿。”“聿，所以書也，楚謂之聿，吳謂之不律，燕謂之弗。”許慎記錄了這麼多筆的別名，惟獨沒有“彤管”，難道是疏忽嗎？《禮記·曲禮》：“史載筆，士載言。”^⑥這都證明先秦古籍中並無筆為“彤管”之說。“彤管”指代“筆”，是漢以後的事。《後漢書·皇后紀序》有“女史彤管，

①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）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
② 清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，《清經解》本，上海書店，1988年。

③ 清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
④ 《史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59年。

⑤ 清王夫之《詩廣傳》，中華書局，1964年。

⑥ 《十三經注疏》（上）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。

記功書過”說法^①。《初學記》引傅玄《筆銘》曰：“韓韓彤管，冉冉輕翰。”^②這又怎樣解釋呢？我們以為秦以後把“管”稱為“筆”可能與造筆者的傳說有關。韓愈《毛穎傳》：“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，而封諸管城，號曰‘管城子’。”^③恬是蒙恬，相傳筆是他發明的，《博物志》有“蒙恬造筆”的記載。筆是否蒙恬所造，且擱一邊，不去理會。但這段記錄有助於我們理解秦以後的人把筆稱作“管”的原因。因為筆是蒙恬發明的，蒙恬的封地在管，所以把筆稱作“管”；就像英語裏把瓷器稱為“中國（China）”的道理一樣。因此我們說，即使秦以後的人把筆稱為“管”，也不能證明《詩經·邶風·靜女》裏的“彤管”指的是筆或赤筆管。

清代姚際恒《詩經通論》認為，“彤管即《內則》‘左佩箴管’之管，其色赤，故曰‘彤管’。毛、鄭以為筆管，未然，‘女’指‘彤管’謂悅此彤管之類也。”^④姚說雖不雷同於前人，然而僅憑《內則》有“左佩箴管”這句話就斷然認為彤管是“箴管”，是乃強詞耳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“孟冬之月，修鍵閉，慎管籥。”鄭玄注：“管籥，博鍵器也。”孔穎達疏：“以鐵為之，似樂管之管籥，播於鎖以搏取其鍵也。”同樣出自《禮記》的“管”却解釋為鑰匙。如果我們不同意姚氏的解釋，按照姚氏非此即彼的邏輯，豈不就可以憑《禮記》裏有“慎管籥”三字把“彤管”釋為“紅鑰匙”嗎？顯然，把“彤管”釋為“箴管”是行不通的。所以此說今人多不採用。

現代又有不少學者以為“彤管”是樂管，以高亨先生為代

① 《後漢書》，中華書局，1965年。

② 《初學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62年。

③ 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。

④ 清姚際恒《詩經通論》，中華書局，1958年。

表。高氏所著《詩經今注》說，“彤管當是樂器，就是紅色的樂管。《詩經》裏的管字都是指樂管。《周頌·有瞽》：‘簫管備舉’。《商頌·那》：‘嘈嘈管聲。’又《周頌·執競》：‘磬筦將將’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、《說文》都引筦作管，所以說此詩的彤管當是樂器。”^①我們也不能同意高氏的說法。爲了說明問題，我們不妨把高氏引證的幾首詩拿出來和《靜女》對比一下。

《周頌·有瞽》：

有瞽有瞽，在周之庭，設業設虞，崇牙樹羽。

應田縣鼓，執磬祝圉，既備乃奏，簫管備舉。

嗙嗙厥聲，肅雝和鳴，先祖是聽，我客戾止，永觀厥成。

《商頌·那》：

猗與那與，置我鞀鼓。奏鼓簡簡，衍我烈祖。

湯孫奏假，綏我思成。鞀鼓淵淵，嘈嘈管聲。

既和且平，依我磬聲。於赫湯孫，穆穆厥聲。

庸鼓有數，萬舞有奕。我有嘉客，亦不夷懌。

.....

《周頌·執競》：

執競武王，無競維烈。不顯成康，上帝是皇。

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。斤斤其明，鐘鼓嗙嗙。

磬筦將將，降福穰穰。降福簡簡，威儀反反。

既醉既飽，福祿來反。

我們可以看出這三首詩和《靜女》相比有三處不同。首先這三首詩都是統治者在祭祀時的頌歌，用高氏自己的題解，《有瞽》是“周王太合樂於宗廟所唱的樂歌”，《執競》是“周王祭武王、成王、康王時所唱的樂歌”，《那》是“宋君祭祀祖先通用的樂

① 高亨《詩經今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
歌”，古代統治者祭祀時要奏樂、跳舞，“美盛德之形容，以成功告其神明”，在反映這種祭祀場面的詩歌裏出現樂器是毫不足怪的。而《靜女》是一首情歌，記載一對青年男女幽會情形的“民俗歌謠”，在這樣的詩裏出現樂器不合情理。《詩經》裏個別寫男女關係的詩裏曾出現樂器，如《周南·關雎》四章：“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”，五章：“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”。《鄭風·女曰雞鳴》二章：“琴瑟友之，莫不靜好”。前者是主人公想像娶親時鼓樂齊奏的熱鬧氣氛，後者是寫宴會時歡樂情景。兩首詩都是寫的家庭生活，在這裏出現樂器是符合客觀實際的。但是《靜女》並不能與這兩首詩相提並論，《靜女》是寫男女幽會的。男女幽會時不會演奏樂器，出現樂器不合乎詩的內容。其次，在這三首詩裏，都同時出現了幾種樂器，《執競》裏有鼓、鐘、磬、管四種樂器，《有瞽》裏有鼓、縣鼓、鞀磬、虞、圉、簫、管七種樂器，《那》裏有鼓、磬、管等樂器。進而察之，管這種樂器又總是和磬、鼓同時出現。而《靜女》裏除了“彤管”外就是“蕘”，樂器和草出現在一起，缺乏內在聯繫。再次，在這三首詩裏，都有表示樂器聲音的象聲詞：《執競》裏有“嗶嗶”、“將將”，《有瞽》裏有“嗶嗶”，《那》裏有“嘒嘒”、“穆穆”。由此可見，高氏所引證的三首詩的性質、內容都和《靜女》並不相同，因此它們之間不能簡單類推。

在我國先秦詩歌裏，有不少關於男女之間互贈信物的記載，如：

“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。”（《詩·王風·丘中有麻》）

“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”

“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。”

“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”（上三例皆出於《詩·衛風·木瓜》）

“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”（《詩·鄭風·女曰雞鳴》）